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57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76年，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期间，群众在天安门城楼前集会。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
 201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群众在天安门城楼前集会。

史
演
研
究
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执政新中国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市老干部局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执政新中国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市老干部局编
—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1

ISBN 7 - 80199 - 142 - 7

I. 执 ... II. ①中 ... ②北 ... III. 中国 - 大事记 - 1949~2004
IV. K27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530 号

书 名: 执政新中国

编 者: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市老干部局

责任编辑: 贾京玉

装帧设计: 烨来图文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蓝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4.5

印 数: 54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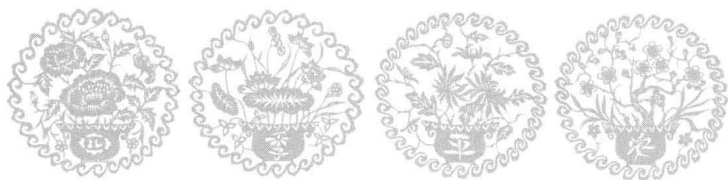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99 - 142 - 7/K · 105

定 价: 29.00 元



1949 年	新中国定都北京	4
1950 年	抗美援朝出兵内幕	8
1951 年	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	12
1952 年	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始末	16
1953 年	“一五计划”绘蓝图	20
1954 年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24
1955 年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真相	28
1956 年	“双百”方针的确立	32
1957 年	毛泽东探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36
1958 年	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出现	40
1959 年	首都国庆十大建筑落成	44
1960 年	会战大庆油田	48
1961 年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52
1962 年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56
1963 年	向雷锋同志学习	60
1964 年	铸造共和国核盾牌	64
1965 年	李宗仁叶落归根	68
1966 年	“五一六通知”出台前后	72
1967 年	动荡中的“二月抗争”	76
1968 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80
1969 年	全国兴起备战高潮	84
1970 年	中国卫星奏响《东方红》	88
1971 年	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92
1972 年	尼克松访华的背后	96
1973 年	邓小平重现中国政坛	100
1974 年	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104
1975 年	排除干扰抓整顿	108
1976 年	“四人帮”落网记	112



编者的话

公元1949年，新中国诞生在世界的东方，古老的中华民族由此迈入了一个伟大复兴的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经历28年浴血奋战后，终于走上了全面执掌国家政权的历史大舞台。

中国共产党执政5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把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55载春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的辉煌。回眸往事，共和国的年轮上镌刻着无数艰辛探索、曲折前进和凯歌高奏的记忆。《执政新中国》选取每年一件大事予以展述，力图为读者勾勒出一个简约的历史画面。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每一页都有浓墨重彩的篇章，即便是从中撷取一些片段和细节，也足以让我们掩卷深思、回味无穷。重温当年的澎湃激情，体验曾经的心血汗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在自我完善中愈益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感知这样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执政新中国》用历史的素材证明了历史的真实。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新的形势任务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温故而知新，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至关重要。《执政新中国》从这样的视角提供了阅读的意义和思考的价值。

历史在前行，中国共产党肩负执政兴国的使命，任重而道远。过去的55年历程已载入史册，今天的挑战又迎面而来。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执政新中国》一定会有更加丰厚、精彩的续篇。

CONTENS

目录

1977 年	恢复高考纪实 ·····	116
1978 年	真理标准大讨论 ·····	120
1979 年	新时期文艺工作的里程碑 ·····	124
1980 年	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 ·····	128
1981 年	中国女排首次夺冠 ·····	132
1982 年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立 ·····	136
1983 年	“严打”战役的决策历程 ·····	140
1984 年	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	144
1985 年	中国百万大裁军 ·····	148
1986 年	科技强国的“863 计划” ·····	152
1987 年	启动城镇住宅改革 ·····	156
1988 年	海南省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	160
1989 年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	164
1990 年	北京燃起亚运圣火 ·····	168
1991 年	两岸关系破冰而行 ·····	172
1992 年	邓小平深圳视察纪行 ·····	176
1993 年	三峡工程建设上马 ·····	180
1994 年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	184
1995 年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双赢 ·····	188
1996 年	东南沿海军事演习 ·····	192
1997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 ·····	196
1998 年	万众一心抗击洪水 ·····	200
1999 年	中美交锋“入世”谈判 ·····	204
2000 年	江泽民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208
2001 年	北京申奥成功纪实 ·····	212
2002 年	胡锦涛的西柏坡之行 ·····	216
2003 年	“神舟”五号圆梦太空 ·····	220
2004 年	强国之路的新探索 ·····	22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下午3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定都北京

1948年初，中国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解放战争进行相当顺利。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思考、筹划成立新中国。4月30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全国各界进步人士的热烈响应。

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设想：1949年9月，在哈尔滨筹备并召开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宣布建立新中国。为了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派出许多干部，把疏散在香港、澳门、上海、广州、重庆等地以及美国、日本、欧洲各国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爱国组织的领导人：沈钧儒、郭沫若、沈雁冰、史良、陈叔通、马叙伦等接到哈尔滨，准备召开政协会议。经过几翻周折，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等三批民主人士先后经香港安全抵达哈尔滨。

那个时候，党内有一种说法，中央打算把新政权的国都定在哈尔滨。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毛泽东在第一次政协会议上说过，“本来新政协会议是要在哈尔滨召开的，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北平获得了解放，这样，我们就请各位代表来这儿开会了，国都问题就可以不考虑哈尔滨了。”由此可见，党中央确实有过新中国定都哈尔滨的打算。

当时党中央为什么打算把新中国的国都定在哈尔滨呢？

因为，哈尔滨是最早获得解放的东北大城市，东北又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同时，哈尔滨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东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另外，哈尔滨离苏联很近，建国后发



壹

玖

肆

玖

年

1949

展经济可以得到苏联的援助。因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非常重视哈尔滨，特地批准哈尔滨为特别市，并准备在这里宣布建国。

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注意力向哈尔滨倾斜，但是，哈尔滨毕竟远在东北，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要转移过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需要—个地方作为转移的中转站。这样，中央又选择了河北的承德，准备把它作为党中央转移过程中的临时所在地。为此，党中央还向承德派出了中央先行警备团打前站，作前期的准备工作。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准备迁往承德时，东北战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增兵东北，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因此，毛泽东果断地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承德。同时，中央军委命令：中央先行警备团就地改编，隶属于冀察热辽军区。甚至在辽沈战役前夕，林彪和罗荣桓还就党中央迁往东北一事去电请示中央，毛泽东回电说：“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不能离开。”

随着三大战役的捷报频传，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形势发展之迅速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不必劳师远征哈尔滨，在那儿宣布新中国的诞生了。因此，把哈尔滨作为新中国国都的想法作罢。至于在哪儿宣布建国？新中国定都何处？毛泽东开始在党内外广泛征求意见。

关于定都问题，在当时实际上争论很大。

除了北平之外，许多人主张定都西安，他们的理由是：首先，中国的革命在西北时间最长，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延安住了13年，今后指导革命，西安也十分方便。其次，

西安是我国历史上的五大古都之一，中国历史上最强盛和时间最长久的王朝——秦汉和盛唐，都是建都于西安。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权秦朝也定都于此，西安自古就有号令天下的权威。为了政权的长久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之计，很多人希望建都西安。第三，从中国的版图上看，西安正处于全国的中心，作为新中国的心脏——定都于此是最好不过的了。此外，西安离苏联也比较近，接受苏联的援助也比较方便。

也有人主张定都南京，因为蒋家王朝的国民政府的国都是南京，我们推翻旧政权后，新中国定都于南京，人们心理上容易接受，在国际上也容易得到认可。

面对种种提议，新中国的首都应该建在哪儿，毛泽东一直在深思中。

1949年春，王稼祥从东北回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安顿下来后，王稼祥与夫人就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见到王稼祥喜出望外，在简单介绍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后，就新中国建都问题征询王稼祥的意见：“我们马上就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确定首都。我们定都何处？中央虽有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对此你有什么意见？历代皇帝定京城于西安、南京、北平，我们呢？”

王稼祥沉思片刻，回答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王稼祥从南京开始分析道：“现在国民政府的首都，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信这一套。但是，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这是它的很大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毛泽东微微点头，表示赞许。“西安如何呢？”“西安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已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今天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合适。”

毛泽东又提到，有人认为开封和洛阳也应该在考虑之列。王稼祥又从交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黄河沿岸的开封和洛阳等古都，因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加之交通及黄河的水患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听完王稼祥对这些城市不适合作为国都的分析，毛泽东又让王稼祥谈一谈把北平作为国都的看法。

看到毛泽东对自己的观点很感兴趣，王稼祥就饶有兴致地又谈起来：我认为作为首都的最佳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扼守联结东北和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重心之所在。同时，它靠近

苏、蒙，与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致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500年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该选在北平。

王稼祥的一番论述，毛泽东感到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不由得朗声笑道：“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政权的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他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

1949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的提议，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最后决定定都北平。1949年9月27日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大会表决通过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

1949

相关链接



北平的和平解放 1949年1月21日，即在天津解放后的第6天，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审时度势，终于决定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八项条件，率部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为新中国的定都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后来当面对傅作义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授予傅作义“一级解放勋章”。解放后，傅作义历任水利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率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离开了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浩浩荡荡向北平进发。当晚在唐县城东淑闫村宿营。24日中午到达保定，晚上抵涿州。25日凌晨3时，中央领导同志改乘专列北上直达清华园火车站。上午，毛泽东等在颐和园短暂休息后，下午到西苑机场阅兵并接见社会各界代表。晚上，正式进驻香山。中共中央机关在香山期间，为保密而对外一律称“劳动大学”。6月中旬以前，毛泽东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居住、办公，以后就改为双清别墅和中南海两地办公。当时，香山对内称中共中央机关，中南海称办事处，中共中央机关大部直到11月才迁入中南海。



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秘密入朝，到达朝鲜前线，和朝鲜人民军密切协同，并肩作战。

抗美援朝出兵内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伊始，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挺进，7月底，直指洛东江三角洲，几万南朝鲜军队和10万多美军被人民军围困在釜山一带的狭小地区。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一直密切注视着朝鲜半岛战局的发展。当朝鲜人民军顺利南进，而后方兵力空虚之时，毛泽东对战局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朝鲜人民军倾力南攻，看似胜利在望，但战局随时可能逆转。这是因为：1. 朝鲜后方兵力十分空虚，人民军后侧有不少适合美军登陆作战的海港守备兵力严重不足；2. 被围困的南朝鲜军队和美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死守，既不反击又丝毫没有撤退的迹象；3. 美军又是一支擅长登陆作战的部队，有着丰富的大规模登陆作战的成功经验。特别是1950年7月8日，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本人就是诺曼底登陆的总指挥，美军在人民军后方大规模登陆，朝鲜人民军陷入两面夹击的危险骤增。

中国有句古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毛泽东意识到上述危险存在的时候，立即写信给金日成，提醒他注意提防敌人从背后登陆，加强海港的兵力，作好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同时指示周恩来，要立足国内，加强边防，作好朝鲜战局恶化时的应变措施，包括准备必要时出兵朝鲜。1950年7月7

日和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研究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亲笔批示：“同意，照此执行。”随后，中央军委把战略预备队38军、39军、40军和炮1师、炮2师、炮8师调往东北，加上原驻东北的42军，共25.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分别进驻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8月初，东北边防军集结完毕，开始集训。9月6日，军委又将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进一步充实东北边防力量。

1950年8月4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提出：为了必要时出兵的需要，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8月18日，根据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建议，中央军委将第9兵团和第19兵团调往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事实证明，这些决定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

1950年9月15日，如毛泽东所料，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成功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28日，“联合国军”占领汉城，切断洛东江地区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撤退。

新中国高层内部，在朝鲜正式提出出兵援朝之前，就已经有了出兵援朝的念头。早在8月4日毛泽东就说过：“如果美帝国主义得胜，就会得意，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但是，中国的出兵有个“底线”，那就是三八线。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9月29日夜，毛泽东得到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毛泽东当即决定，由周恩来总理在9月30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10月3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疯狂北犯。

10月1日夜，金日成分别向苏联和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

最先收到求援信的斯大林，顾忌到苏联的参战会引起美苏冲突，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接信十分钟后就电告毛泽东，建议由中国出兵。同时，朝鲜副首相兼外相朴宪永携金日成的亲笔信飞抵北京，当面向毛主席、周总理恳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兵支援。金日成又在平壤紧急召见我驻朝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武官柴军武，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兵入朝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接到朝鲜的求援信和斯大林的电报后，在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严肃地讨论着出兵问题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会议一直开到天亮。10月2日凌晨2点，毛泽东电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来京开会，并命令东北边防军随时待命出动。

10月2日下午3点左右，毛、周、朱、刘、高岗及聂荣臻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在会上，毛泽东谈到他曾和林彪谈论出兵朝鲜的一些分歧。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工作都还未就绪，而美国是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美军火力强大，又有强大的空军掩护，我们的海空军刚刚组建，我军参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在敌我装备悬殊巨大的情况下，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新中国划不来。经过一番讨论和是否出兵的利弊分析，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出兵朝鲜。

关于入朝部队的统帅人选，中央最初考虑的是粟裕将军，但此时粟裕正身患重病；后中央又让林彪挂帅，林彪托词不愿。毛泽东讽刺说：“林彪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能率兵打仗呢？”经毛泽东提议，中央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出征。会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安排专机把彭德怀紧急接到北京，共商出兵大事。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在发言中，彭总谈了自己的观点：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了几年。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彭总的分析有理有据，于是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早日出兵，因此毛泽东决定10月15日出兵朝鲜。10月8日，毛泽东正式下达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10月14日，已经在筹划次日渡江事宜的彭总，接到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命令志愿军各部原地训练，不要出动，并要求他火速回京。原来，苏联方面答应的出动苏联空军进行配合的事情出现了变故。

在国内积极讨论和周密策划出兵朝鲜的同时，中国同苏联的谈判也在同步进行中。对于中国出兵朝鲜，斯大林答应苏联出动空军配合，同时苏方表示愿意以低价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装备。

10月10日，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准备入朝参战的时候，苏联通过驻中国大使馆告知周恩来，原商定苏联方面出动空军部队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之事，由于苏联方面没有作好准备，所以他们的空军暂不能出动。

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足足考虑了10多分



钟，然后说道：“……恩来，我看这事要重新考虑。恐怕要劳动你去莫斯科一趟了……”

两天后，经毛泽东与政治局诸位同志的研究，决定暂缓出兵，派周恩来飞往莫斯科，去见斯大林。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没有任何进展，斯大林的决定很难改变，苏联空军指望不上了。

由于出兵问题的困扰，毛泽东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脑子里翻江倒海，思来想去，最后终于拿定主意：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也要入朝参战，因为时不我待，战机稍纵即逝。主意已定，立即发报莫斯科，电告周恩来：政治局全体同志一致认为我军是出动到朝鲜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周恩来久久凝视着电报内容，惊讶之外，一种振奋之情从心底升起。

周恩来马上通知苏联外交部，要求尽快和斯大林会面。在斯大林办公室，周恩来声音朗朗地对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刚刚拍来电报，我们中共中央已经再次作出决定，立即出兵朝鲜。”当苏方翻译把周恩来的话译给斯大林听时，斯大林沉默半晌，默默无语。他知道这个决定的背后，意味着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困难，将要付出什么样的牺牲！“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斯大林自言自语道，心地涌起一种由衷的敬佩之情。

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秘密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

相关链接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 苏联空军在志愿军入朝的第一次战役打响后，开始秘密进驻鸭绿江北岸，其作战空域仅限于中国境内。当第二次战役打响前后，苏联空军进入朝鲜半岛，掩护我军交通运输线。但是，为了防止暴露身份，苏军制定了多项保密措施，如将苏军飞机上的徽记抹掉，代之以中国军队的“八一”标记。飞行员穿中国军服；禁止在美军控制区和海上作战；不准和中国人一起照相，也不准互送私人照片；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在电台中讲俄语。在三年的战斗中，苏联空军至少出动了五个团的兵力。至今，旅顺苏军烈士陵园中还保留着202座前苏军飞行员的墓碑，他们牺牲时间都在1950年至1953年之间。

1951年10月起，在“增产节约运动”的过程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让毛泽东主席感到十分震惊。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开始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三反运动”、打击贪污腐败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一案。历史表明：这件事整整教育了一代人。

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党内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时警告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的这些话被不幸言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的典型。

1951年11月下旬，在中共河北省召开的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原书记刘青山的巨大贪污案被正式揭露出来。

最早揭发刘青山、张子善二人问题的是当时天津专署的副专员李克才。

据李克才回忆：早在1950年，他就向省委反映过刘青山吸毒和他们挪用公款等违法乱纪问题。但是，未引起省委的重视。1951年夏季，河北省决定调动刘、张的工作，二人都想自己留下，闹起内讧，暴露了所谓“机关生产”的秘密，引起省委的警觉，此案被“正式列入议程”。而刘、张问题得以“正式列入议程”，则始于李克才多次地向省委组织部、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揭发。

1951年10月4日，李克才向省政府一位领导反映刘、张私自动用地方粮、修飞机场节余款及银行贷款搞所谓的“机关生产”。李克才后来又向省委的其他领导反映过刘、张的问题。当时河北省委主要领导对刘、张的问题有所察觉，但未认识到那么严重程度，还想实行批评、保护政策。但李克才认为刘、张已经彻底变质，再也不能容忍下去，毅然向省委组织部长、省纪委副书记薛迅正面揭发了刘、张的问题，这才引起省委的足够重视。1951年11月，省委派出检查组到天津地委开始调查此案。



壹

玖

伍

壹

年

1951

1951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在当时的省会保定，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部署。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被与会代表集中公开地揭发出来。

根据二人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将主犯刘青山、张子善予以逮捕，同时协同天津市人民政府立即拘押与本案有关的案犯。中共中央华北局接到省委的请示后，经过讨论并报请总理批准，决定将他们逮捕法办。1951年11月29日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12月2日，刚从国外归来的刘青山被逮捕归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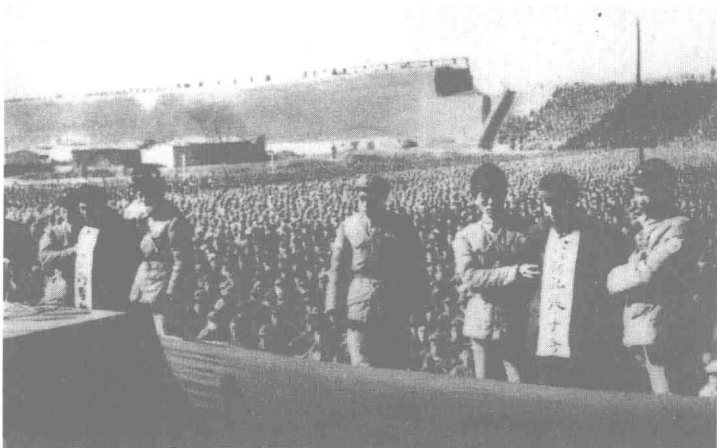
12月4日，根据代表们的建议，河北省委经过研究，并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通过了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12月5日，华北局召开会议听取河北省党代会的情况和逮捕刘、张的经过。会上，华北局第二书记刘澜涛同志指出，刘、张事件说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已经侵蚀了我们的党，将他们逮捕是完全应当的。建议组织专门的班子全面审查处理此事。随后，河北省政府决定以杨秀峰、薛迅，省纪律检察委员会主任董鲁安、副主任李国华，省检察署检察长孙光瑞，省法院院长宋志毅等六人组成“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主任杨秀峰，副主任薛迅。该委员会一成立，薛迅及各委员立即偕大批检查人员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

经过详细的调查和侦讯，很快搞清了他们的犯罪事实：

一、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水灾区救济款，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款项171亿多元(均为旧币)，用于他们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

二、勾结奸商张文仪等人，用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给国家造成了21亿元的损失；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救灾款从东北盗购木材，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

三、以高薪为诱饵聘用31名国营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



1952年2月，河北省召开公审大会，审判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成立了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经营。

四、在兴建潮白、永定、大清、龙凤、海河等工程中，把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 22 亿元。

五、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 3.7 亿多元，其中刘 1.8 亿多元，张 1.9 亿多元。刘青山还吸毒成瘾。张子善为逃避罪责，曾一次就焚毁单据 300 张。

1951 年 12 月 14 日，根据刘、张二人犯罪事实，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12 月 20 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二人的处理意见：为了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注：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当时之所以加上“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

鉴于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身居高位和此案的巨大影响，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考虑对他们的量刑时十分慎重。1951 年 12 月下旬，中共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向天津地委和所属部门征求对刘、张二人的量刑意见。其结果是：地委在家的 8 个委员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 552 名党员干部中，同意对刘青山判处死刑的有 535 人，同意判处死缓的有 8 人，同意判处无期徒刑的有 3 人，同意判处有期徒刑的有 6 人；而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有 536 人，同意判处死缓的有 7 人，同意判处无期徒刑的有 3 人，同意判处有期徒刑的有 6 人。党中央及时把上述材料送给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听取他们对此案的量刑意见。

在广泛听取各方面的量刑意见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公审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据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在公审宣判大会召开前，刘青山、张子善的老上级，曾经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二人成长的黄敬同志（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找到中央主管“三反运动”的薄

